

周恩来与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的一些小故事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污泥而不染”。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冀朝鼎是谁？他做过什么？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蒋介石唯一的私人政治顾问、美国学者拉脱摩尔则评价：“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三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大同盟成立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掌管一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冀朝鼎从陈光甫这位老练的经济专家那里获益匪浅，他详细了解了一个国家外贸体制的运作机制和特点。但回国后，冀朝鼎还是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拉脱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下一封书信。信上说：之时时局严重，国运益艰，仍需兄大展才能之际，深望能更多贡献。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封信给他以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了大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它办法就没有其它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经济决策正从追求完美走向接受次优

■ 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王宇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塞勒长期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通过探索人类的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自我控制缺失等特征，阐述人类心理因素对经济活动、市场运行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在个人决策的经济分析与行为选择之间搭建起桥梁”。

一、从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

20世纪前后当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走向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家努力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演变成为一个用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不仅成为教科书和研讨会的主流理论，而且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得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社会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认识，但是，在不断走向形式化、数理化和工具化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其解释力和判断力。从20世纪中后期起，理性预期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家相继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21世纪初，行为经济学家开始登上诺贝尔经济学的领奖台。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哈佛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Elvin Roth)，表彰他在市场研究方面的贡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耶鲁大学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尽管他们的观点截然不同。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塞勒，肯定了行为经济学的贡献。从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第一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共有79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塞勒是第一次单独获奖的行为经济学家。

二、从理性经济人到真实的人

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传统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总是理性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正是由于行为主体的充分理性，使得市场供求达到均衡。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塞勒等经济学家吸收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提出了“非理性经济人”概念，极大地丰富了对人性和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解。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用社会偏好解释利他行为。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主要考虑收益最大化。塞勒认为，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人们会受到许多心理因素影响，比如，对不公平的厌恶和对正义的向往。如果这些情绪足够强烈，就可能驱使人们改变自己的决策。塞勒通过实验方法证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有多么强烈时会使人改变行为决策。塞勒通过多种实验来检测个人的利他合作倾向，以证明人类社会除“个人偏好”还存在“社会偏好”，除“利己行为”还存“利他行为”。二是用心理账户说明价值决策方法。塞勒举例说，如果人们要购买价值5万的奢侈品，对着工资卡会犹豫再三，对着中奖的彩票会马上行动。同样的5万元，由于收入来源不同，消费决策也会不同。这是由于人们设定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使人们在以不同形式获得收入时，消费决策或投资行为会出现较大差异。

心理账户意味着人们内心存在着决策的参考点，这是一种简化的交易决策方法。三是用过度反应解释金融市场波动。塞勒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实，在股票市场上，当牛市来临时，人们对投资更自信，直到股价偏离企业的投资价值。当熊市来临时，人们对投资彻底失望，直到股价从另一个方向偏离企业的投资价值。过度反应心理使人们过于重视金融市场波动，从而忽略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趋势。

三、从追求完美到接受次优

塞勒提出的“非理性经济人”是真实的人，是现实中的我们，会犯错误，存在偏见，可能做出非理性选择。在“非理性经济人”假设下，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承认人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直面人性的不足和缺陷。从传统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表明主流经济理论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革，经济决策正在从追求完美走向接受次优。

理解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视人性的不足和缺陷，是我们认识人类经济行为和决策的前提。在经济决策研究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决策方面，应当充分理解人的复杂性，敬畏人的多样性。从根本上讲，一个好的金融制度无论设计还是运行都需要包容人类的差异、接纳人性的所有美好与不足。

总之，人类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我们做出的经济决策、制定的经济政策总有可能存在不足甚至缺陷，因此，我们需要接受次优：一种不完美、但愿意正视不足，愿意接受批评，愿意不断改进的个人决策、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

五位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陈兴动(巴黎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这个题目相信大家都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今年大家最想得到的答案。题目这样提出就说明了两个含义,一是意味着复苏的增长,现在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了,去年的复苏去年讲得很好。去年无论多么悲观的人,到去年底,特别是三四季度以后,肯定可以说经济增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中国经济超出预期,超出目标增长,增长非常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比较完整的检验世界上180个国家,75%国家表现经济检验增长加速,这是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意思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增长,70%国家经济增长超出潜在增长率,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中国官方对世界经济看法,过去讲复苏动力很脆弱,不稳定不确定观念,这个现在不提了。但是对世界看出来,既然题目是这样提的,就说明今年2018年有一些人开始怀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悲观派,太多怀疑论证在这里,2018年情况怎么样,刚才乔虹把她的观点分享了。其实2018年

对全球的看法应该说不是一样的,而且观点还是相当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对趋势的浮动差别,还是有一个方向性差别。我这一段时间是作为市场经济学家很关注大家的观点,我观察起来有三个观点。第一,世界经济告别危机,开始复苏轨道。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么多年,现在提出进入复苏轨道。第二,世界经济的繁荣将继续大步前进。第三,我们需要知道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全世界复苏与各个国家不一样,他们复苏路上处于这个周期里面不同阶段。

刘利刚(花旗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总的来看,大家对2018年是稍微乐观一些,全球经济是一个继续复苏,已经进入了第九第十年经济复苏的过程。美国经济从历史周期来看大概有一个8—10年周期过程,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么长的逐渐复苏过程,经济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看下一步是不是劳动生产力有一个大幅度上升。但是这个数据里面,其实很多经济学家是非常悲观的。如果看美国劳动生产力前十年是

1%左右,与金融危机相比劳动生产力是2.5%左右,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虽然经济在成长,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新的科技突破使劳动生产力有一个上升。用一个最基本的这种增长模型来算的话,在美国没有一个科技突破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增速不可能在特朗普所说3—4%增长速度。另外,这次经济复苏周期之所以成熟,另外一些表现,如果看美国经济消费对GDP贡献,是主要一个推手。美国家庭负债率已经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在今后如果说企业不投资的话,我觉得消费继续涨幅也是很难出现。虽然美国失业率很低,但是美国劳工公司的增长非常的疲弱,这是为什么这次大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用的最好的工具就是菲利普曲线,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失效了。为什么劳工工资在西方世界不增长,这里面有很多中长期结构问题,我所看到一些文章是说在前一阶段劳动力的力量太大,而工会力量在逐渐的减少。劳工他的与资本家谈判,要求增长工资能力是越来越衰弱,全球化是这

样的一个趋势。第二个问题特朗普减税是不是今后会给美国公司投资创造新气象,这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乐观,特别是从花旗我们自己的预测,2018年是2.8%左右比税改之前稍微提了0.1%,原因是你如果讲美国企业投资的话,它早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做这个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美联储已经把美国的利率降低到0左右,美国的这种利率水平在多少年来是最低的一次,企业为什么不去投资,不去投资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美国很多行业,它也面临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制造业方面已经输出了,服务业也不需要很大投资。这样一种情况下,特朗普减税政策对美国影响不是很大。这次减税对中产阶级影响,你要是美国中间收入人群,这次减税只能销售900—1000美元降税,这个900—1000在这种情况下对中产阶级杯水车薪。对于富人来说减税幅度比较大,但是富人已经消费很多,不需要减税增加消费。这种状况对美国投资没有太大影响。(下转A3版)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之名的金圆券的庞大按照设计,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之名的金圆券的庞大按照设计,